

URBAN SOCIOLOGY

INVESTIGATION OF URBAN SOCIAL LIFE IN BEIJING



城市社会学 北京城市社会生活调查

李强 王昊○主编

URBAN SOCIOLOGY
URBAN SOCIOLOGY
URBAN SOCIOLOGY
URBAN SOCIOLOGY

城市社会学
北京城市社会生活调查

李强 王昊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社会学：北京城市社会生活调查 / 李强，王昊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5097 - 4551 - 9

I . ①城… II . ①李… ②王… III . ①城市 - 社会生活 -
社会调查 - 北京市 - 文集 IV . ①D67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0348 号

城市社会学

——北京城市社会生活调查

主 编 / 李 强 王 昊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 子 信 箱 / shekebu@ ssap. cn

项 目 统 筹 / 童根兴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 任 编 辑 / 胡 亮

责 任 校 对 / 刁春波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551 - 9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26.75

字 数 / 443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本书是笔者在清华大学讲授城市社会学课程时，组织学生进行北京城市社会调查的一些成果。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核心课程之一，而城市社会调查可以揭示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总结这些调查成果对于开展学术研究和了解城市社会生活都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冠以“城市社会学”书名，那么，究竟什么是城市社会学呢？用学术的语言说，城市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城市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就是说，对于城市的研究可以有不同学科的角度，诸如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历史学、城市社会学等。那么，城市社会学的特点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在所有研究城市的学科中，城市社会学的综合性特点最为突出，也就是说城市社会学在对城市的探索中，综合进了诸多学科的知识体系。笔者在课堂上比较多地讲授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城市社会学诸多的理论视角特别突出地体现了城市社会学的综合性知识体系的特征。

什么是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呢？理论视角（theoretical perspectives）指不同的理论流派思考、观察事物的不同角度。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笔者近年来在清华大学讲授城市社会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笔者以为，从最大的城市社会学的观察角度看，可以说有四个大的理论视角，即生态的视角、社会活动方式（或生活方式）的视角、政治经济的视角和空间结构的视角。但是，由于从生态角度探索城市社会的理

论家队伍十分庞大，内部又可以分为众多的流派，所以，如果将生态派分为四个流派的话，那么，探索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就可以分为七个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下面分别述之。

第一个是最为传统的生态派，叫作“传统城市生态学派”（或曰“古典城市生态学派”）。提起传统城市生态学派就不能不说到城市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从欧洲传到美国以后，实证的色彩更为浓重了。一方面，美国学术界自身的实证主义就很强势，另一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芝加哥城市自身处于“城市化”急剧扩张的过程之中，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丛生，也迫切需要城市研究者的参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聚集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家既投身于城市社会学的学术探索，也投身于发展中的芝加哥城市的探索之中。于是“传统城市生态学派”应运而生。说它是生态派，是因为这一学派观察城市的角度着重于“生态”（ecology），即将城市社会视为一个生命网。生命网（Web of life）思想最早可以溯源到达尔文的研究，即从食物链的角度看，发现不同生物体形成了一个生物的或生命的网络。社会学家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社会与社区的研究之中，发现了人类的生命网现象，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普遍存在着依存、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等关系。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最初由斯莫尔创立，后来涌现出一大批包括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和F. W. 兹纳尼茨基（F. W. Znaniecki）等在内的著名社会学家。然而，就“城市生态派”而言，几位最突出学者当属帕克（R. E. Park）、麦肯齐（R. Mckenzie）和伯吉斯（E. W. Burgess）等。相比较而言，还是帕克的贡献最突出。这不只是因为帕克最先使用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概念，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帕克是一面旗帜，他提出了城市生态研究的具体计划，并亲自带领学生实施这一计划，完成了专门研究芝加哥城市社会的一大批成果，真正将社会学带入实地研究的领域。当然，伯吉斯的贡献也很大，他应用生态派的思想以芝加哥城市为例提出了关于城市空间布局的构想，后来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学者越来越多，已经足以撑起一个独立的流派。所以，笔者在讲课时不再放在传统生态派里讲，而是放到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中作专门阐释。

第二个是所谓社会文化生态学派，这一派在城市社会的研究中突出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其实，在传统生态派的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生物要素与文化要素二元论的矛盾，即决定城市社会结构与城市生产、生活方式

的首要因素，究竟是生物要素还是文化要素，帕克始终在两者之间摇摆。文化生态学派明确提出决定城市社会结构、社会空间与行为方式的首要因素是文化因素，而不是非人格的生态力量。文化生态学派也用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证明，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更大程度上受到市场竞争、土地价格、政治制度、政策措施，以及价值观、习俗、道德、感情、象征符号等的影响。人类与其他动物不一样，不是简单地由生物、自然环境就可以决定的，人类首先是文化的动物，人类生活的城市社区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所以，文化要素、社会要素是城市研究中的关键。

第三派号称“新正统生态派”。如果说社会文化生态学派更强调文化要素的话，那么，新正统生态派更突出生态因素的重要作用。新正统生态派是对传统生态派的继承。1950年A. H. 霍利发表了《人类生态》一书，重新阐述了传统芝加哥学派的立场，故称“新正统生态派”（Neo-Orthodox Ecology）。新正统生态派试图破解传统生态派在生态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两者之间摇摆的“二元论”困境。霍利认为，社会文化要素与生态要素并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的，文化现象并不在人类生态领域之外，而在生态领域之中。人类为了适应生态环境、适应自然生态、适应城市聚集生态而发展出了技术、文化等，所以，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文化等只不过是自然界中的适应机制的一种形式。新正统生态派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城市生态分析的一些模式。比如，邓肯（Otis Dudley Duncan）提出了“生态复合体”（ecological complex）分析模式。生态复合体可以指一个大城市，也可以指一个小社区。邓肯提出生态复合体由四个相关联的变量构成：人口、组织、环境、技术（POET），用这四个变量的关系可以解析城市里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受到该模式的启发，笔者与陈宇琳博士一起也提出了“人口、产业、环境、技术、制度、规范、观念”（PIETING）的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的范式也是属于城市生态的分析范式。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要素在城市人口聚集的背景下交互影响，既是体现问题发生的路径，也是试图解决问题的路径。笔者提出的分析框架与邓肯框架的不同之处在于，笔者更强调人类自身的因素在城市生态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在笔者的框架里属于人类行为的因素就突出了三个：制度、规范、观念。也就是说，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里，制度设计的水平、管理的水平、人类行为是否遵守规范、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都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城市是否和谐的重要因素了。今天，中国城市化处于高速发展的阶

段，城市社区处于剧烈变迁之中，城乡人口也处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流动和大规模迁居（包括“改善型居住”的搬进新房子或搬新家）之中，所以，城市生态也处于“人口、产业、环境、技术、制度、规范、观念”七要素的碰撞、冲突、调适过程之中。尤其对于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在人口高度聚集的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几十个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人们行为的累积冲击力是极其强大的。所以，笔者的分析范式，特别突出了制度、规范、行为、观念对于城市的影响。如果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缺少制度、规范、行为、观念的约束，那么，整个城市体系就会出现严峻问题。所以，在这里社会要素与生态要素已经融为一体，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城市生态的概念来显示整个城市体系。

第四，城市规划界的生态城市思想。笔者之所以将“城市规划界的生态城市思想”单独归为一派，是因为，它在理论思想和学术脉络上来自一个独立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大多直接参与了城市的规划建设。其思想通常溯源与英国人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1850 ~ 1928）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当然，城市与自然相平衡，也是源于前述的生命网思想。霍华德强调“田园城市”同时具有城市的和农村的优点，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霍华德之所以强调生态城市，是由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及城市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京津冀严重雾霾”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霍华德属于积极的行动者，他先是到美国去积极参与“宅地法”的实施，回到英格兰后又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所以，他是一名积极的改革者。他的著作最初题为《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后来才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今天已成为城市规划界的必读书了。霍华德也曾经将他的田园城市思想付诸实践，包括在英格兰距离伦敦仅30英里的小城镇Letchworth，设计了田园城市，1903年建成，迄今仍然称得上是宜居城市。

后来的城市规划界大体上传承了他的思想，这一派人物众多，简单介绍几位。比如，格迪斯（Patrick Geddes），他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调查应先于规划，这里的调查不仅要考察物质的建筑环境，而且要考察该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他提出市民应参与城市规划等。又如，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他在著作《明日城市及其规划》中探讨了当代数百万人的巨型大城市的规划原理，提出了大城市的基本要素是摩

天大楼、快速交通和大片绿地等。再如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他将生态思想应用于建筑设计之中，提出有机建筑和草原式住宅，亦被称为草原学派 (Prairie School)，突破了传统的欧式建筑，创造了真正具有美国特点的建筑。还有，英国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彼得·霍尔 (Peter Hall)，完成了《明日之城》《世界城市》等 30 余部著作，提出了全球视野下的新区位观，认为在全球化局面下新的世界城市体系在形成。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生态城市 (ecological city) 思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规划师的共同理念，1972 年 6 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提出对人类的定居和城市化必须加以规划。此后，不少建筑师、规划师、生态学家提出了生态城市的诸多原则，比如生命、美景、公平是生态城市的准则，就近出行原则，将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出行置于比小汽车更优先的位置，社区的花园化，提倡简约生活、反对过多地消费资源和过多地消费商品，等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著名规划师、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的“人居环境思想”。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局面，同时也是响应 1992 年的里约热内卢全球首脑会议对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的呼吁，吴良镛教授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建筑规划理念和理论体系。人居环境“学术框架”包括：人居环境由自然、人、社会、居住、支撑网络等五大系统组成，人、自然与社会需要协调发展；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需要从全球、区域、城市、社区（村镇）、建筑等五大层次进行；人居环境建设要有统筹观念，遵循生态、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五大原则。吴先生提出的理念也是总结了我国几十年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近年来我国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和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吴先生强调人的中心位置、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心位置。这些，对于维护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我国城市建设与生态的平衡，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均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对于这一派，过去的说法是“城市性”理论，意思比较费解，所以，笔者改称为“城市社会活动形式理论”。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社会活动形式与农村居民的社会活动形式完全不同。当然，也有人称之为城市生活方式学派。但是，这里所说的不同不仅是指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指生产方式的不同。所以，笔者以为，还是用“社会活动形式”的说法更为准确，由此也可以看出该理论的视角是在

对比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这一派早期的突出代表恐怕要属齐美尔 (G. Simmel) 和沃斯 (Louis Wirth) 了。齐美尔的思想特别体现在他的著名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的演讲之中。该演讲分析了当大量人口聚集在都市里，人们相互之间不再具有乡村人之间熟悉的亲情，这种匿名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城市活动形式的后果，分析了大城市的环境对于人们行为、态度的影响。齐美尔的主要观点是，都市环境对于人的过度刺激以及对金钱交易的刺激，制约着都市人的精神生活。齐美尔提出，由于大量人口在高密度的城市的集中，个体不断地受到物质和社会刺激的冲击，该刺激是如此之强大，城市中的个体根本无法作出反应。因此，城市居民必须有一些“屏护设施”，使他们能够对于主要的刺激作出合适的反应。齐美尔对城市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城市人格类型的研究，其主要兴趣是试图发现城市中的个体是如何适应城市中的巨大差差异性的。可以用齐美尔的思想反思今日中国城市社会关系。今日中国城镇化迅速推进，据报道，近 10 年来全国每天都有数十个村庄在消失，人口急剧地朝大城市聚集，数以亿计的城市外来人口恐怕还无法完全适应城市的活动方式。所以，齐美尔的观点对于分析今日中国的城市社会关系、人际交往、活动方式，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沃思的观点则表述在他的那篇经典论文之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特性》(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可视为城市理论中生活方式派的开端。沃思分析了城市的生态和人口结构，注重城市居住的心理与行为的结果，认为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沃思称为“城市特性”。沃思认为，城市的三个最主要特性是：第一，规模大、人口多；第二，密度高；第三，人口的异质性强。沃思的观点众所周知，恕不赘述。属于这一派的还有我国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吴先生在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初废止社会学之前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专门讲授城市社会学。他的名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依据人口密度和职业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四类，探讨中国作为第四种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

第六个是“城市政治经济学派”。该理论从政治、经济的视角观察、分析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强调政治经济因素对于城市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其实，如果突出城市社会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流派的话，那么，可以说一派是城市生态派，另一派就是城市政治经济学派。两个流派在关于城市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上都是不一致的。在对于城市性质的认识上，城市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城市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认为城市的变迁源于人们对资源的

争夺和竞争；而生态学派认为，城市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变迁源于人口的增长或移民的迁入。在关于城市土地使用的决定因素方面，城市政治经济学派认为是：政治权力、政府行为、利润驱动以及经济制度。而生态派认为是不同功能的空间分割、与市中心的关系，以及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受到土地价格的影响。在关于影响城市人口居住模式的因素上，城市政治经济学派认为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各群体对于经济资源的争夺、种族歧视等制度因素，而生态派认为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各群体对于空间的争夺、种族民族群体的内聚力等。在关于影响城市社会规范的因素，城市政治经济学派认为是统治群体（阶级）的利益、价值观、群体（阶级）之间的冲突，而生态派认为是人口的规模和人口密度等。

城市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阵营十分强大。早期的社会学大家如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都属于这一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十分流行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当然也属于这一派。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以研究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意义而著称，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派别，重要的著作有《城镇的权利》（1968）、《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2）、《空间的生产》（1975）等。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政治性，空间离开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就不是一种科学对象；还提出了“政治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精神空间生产”的概念，分别指国家等政治权力所界定的空间、社会各阶层的空间分布，以及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义务。总之，空间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大城市与小城市、城市与农村、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空间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尤其是巨大财富聚集的大城市的空间，商业的或政治中心体的空间位置体现了权力、财富、地位。由此，笔者想到，在北京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曾经有房地产商提出，北京的中心区域地价很高，已经不适合穷人居住，提出“穷人搬出去、富人搬进来”，这样的口号立即受到舆论的普遍抨击。这恰恰说明我国社会转型期异常复杂的空间社会关系。

又如，提出“新城市社会学”的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教授。卡斯泰尔是列斐伏尔的学生，后来又一起共事。卡斯泰尔关于新城市社会学的观点，最初表述在他的《城市问题》一书中。卡斯泰尔更为感兴趣的是城市中斗争的群体，而不是城市空间本身。他提出要重新构建“城市社会学”的目标，即确立城市社会学的真实研究对象，并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在城市社会学已有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两方面：空间和集体消费。

空间历来受到关注，卡斯泰尔则大大扩展了集体消费的研究。所谓“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指国家提供或支持的公共物品的消费，包括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集体消费揭示的是国家在影响消费方面有巨大功能。笔者以为，集体消费现象在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里运作机制是政府主导型的，另一方面，城镇化处于迅速扩张期，城市建设的途径大体上都类似于集体消费的方式。大规模的政府用房和居民小区住房的建设，特别是能体现地方政绩的各类公共工程，如各类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的建设，都属于集体消费的方式。问题是这类集体消费动用的是公共财政，都是纳税人的钱，建设是有效益的吗？建设的成果能够让绝大多数老百姓共享吗？近来不少地方发生政府财政巨大赤字，更有很多铺张浪费的建设不但无效，反而有害。这些都是卡斯泰尔的集体消费理念告诫我们需要予以反省的。

再如，城市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他关心的是城市空间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探讨的核心是体制的不公正，以及此种不公正如何表现在城市环境中。哈维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一面镜子，要理解城市，就要理解指导着城市投资建造环境程序的那些规则。而这些规则究竟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是受到背后的利益集团制约的。富有者可以享受城市扩张的好处，而避免不利之处，比如搬到郊区去住，避免了市中心的犯罪、污染、交通拥挤等。而劳工阶级得不到城市扩张变迁的好处，却承担了它的很多代价。于是富裕者住在郊区，贫穷者住在市区，因种族、民族、不同收入层而形成的居住区域，哈维认为，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资产阶级追求其目标的必然结果。

总之，对于今天我国的城镇化和城市社会学研究来说，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处于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现在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定位会塑造今后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的城乡生活的基本格局。而在我国真正影响城市规划的是政治经济的利益，某些集团的利益、权力在城市规划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表面上是一些房地产公司在城市扩张中发挥巨大作用，而背后是各种利益集团。真正影响着城市规划的主要因素是政治经济因素。某些群体、利益集团在城市发展中谋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另一些人则是利益受损。这些从近来的所谓“房叔”“房嫂”“房媳”“房姐”的网络曝光中得到印证，也从不断发生的拆迁事件、群体事件中得到反映。所以，今天我国的城市

发展、城镇化，应首先考虑如何维护城乡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考虑如何拓宽当地居民参与城市发展决策的渠道和增加他们的经济机会，这些都体现了城市社会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派的意义。

第七，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在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归类上，也有将空间结构的研究归入生态派的，因为其最早探索也是由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做出的。但笔者考虑到从后来的发展看，空间结构的研究越来越走向专门化，所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流派。这一类研究目前也有不同名称，除了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的说法以外，还有称作“城市居住结构理论”或“城市土地使用理论”等，但所指的其实都是同一内容。此种理论最初是城市生态研究的延伸，社会学历来讲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模式，即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模型。伯吉斯的同心圆假设，是对于芝加哥城市的实证分析，发现异质社会群体在芝加哥城市资源竞争中形成了五个同心圆区域的布局，每个同心圆区域有不同的功能，从中心商业区域开始向周围扩张。北京市的发展也很类似于此种格局，所谓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显然属于同心圆结构。全国很多城市学习北京，也是“摊大饼”似的向周边扩张，但是，同心圆结构造成中心城区巨大压力的诸多弊端也凸显出来。第二种传统模型是霍伊特（Homer Hoyt）提出的扇形结构理论，即认为城市中具有同一种性质的区域从中心向外围发展，比如一些商业街区，沿着街道向某一个方向扩展，是按照扇形发展的。目前，我国的一些城市的新城区、开发区的建设也有此种特征。第三种传统模型是哈里斯和乌尔曼（Chauncy D. Harris and Edward L. Ullman）提出的“多核心模型”，这反映了美国城市发展中的非中心化趋势。在此模型中，一些相似的活动需要相似的条件于是聚集到了某些区域，而相互排斥的活动则会分化到不同的区域。土地价格显然也是形成多中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历史上，1950年，梁思成教授与陈占祥教授曾经一起提出多中心布局的建议（即著名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北京建成“旧城中心区”“行政区”和“商务区”形成三个中心，这是典型的多核心结构，可惜没被采纳。所以，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有机疏散”思想是很高超的，然而，今天要想真正改变北京的同心圆结构，重新创建和构造多中心结构难度已经很大了。所以，城市空间布局应该是由高手运作、顶层设计的，一旦布局失误，要想纠正则是很难的事情。

随着计算机技术、空间结构测量技术、经济社会空间数据技术的发展，

今天，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与方法均有了极大的进展。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城市空间数据库，将每一座房屋、建筑、街区、住宅区的人口、社会经济数据都落到了有经纬度的空间位置上，空间内人口的数据十分详尽，包括人口基本情况以及教育、职业、收入、家庭、孩子人数、母亲工作与否、房屋类型、消费状况，甚至连消费的每一件商品的品牌、数量等都有详细记录。此种多变量、巨型空间社会经济数据库的建立，为城市的空间布局、城市规划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城市社会学家不再仅仅局限于个别社区的研究，他们还用这种大规模数据，对整个城市进行研究，发现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规划学校、医院、物流、商店、住宅的空间位置都有了可靠的建设依据。这是一种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空间相结合的整体研究，也有人称为“社会空间因素生态学”。该类研究运用了很多新的数据分析技术，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可以探索城市新生社会结构。而空间研究是一定要落实到土地上的，所以，也有学者提出“土地使用的整合模型”（integrated model of land use）。该模型将前述的同心圆模型、扇形理论、多核心模型等各种模型都包容在内了。该理论认为，如果将地理和历史因素也考虑在内的话，该模型可以用于解释任何城市的任何群体或经营活动的空间定位。

前文多次提过，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高峰期，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城市如此规模的扩张是史无前例的。而从各地的实践看，目前，由于一味地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很多地方兴起了“造城运动”的狂潮，问题也很严峻。规划水平很低，更谈不到上述的以经济社会空间数据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了。所以，此处谈到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技术、方法，对于今日中国的城镇化是有重要意义的。各地的管理者、领导人员应接受城市社会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培训，城市空间布局要有多方面意见的参与，包括专家的意见以及老百姓的意见。好的城市空间布局会为子孙万代留下宝贵财富，而低水平的或错误的布局则会贻害万年。

以上就是对城市社会学理论流派和理论框架的概括介绍。那么，这样的理论框架与本书的北京社会调查的诸多案例是什么关系呢？

可以说理论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导读的框架，即不同的理论视角是观察城市的不同切入角度。本书共分为四编，第一编城市化，更多的是从社会各个群体、阶级、阶层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城市生活，这显然属于“城市政治经济学派”的视角。第二编城市社区，社区是关于人口、地域、社会的

综合概念，所以，这一编里有多种视角，《两小区的停车道路》与《大学校园认知地图初步研究》，都比较偏重于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而其他几篇则是综合了城市生态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的视角。第三编都市文化，则是比较典型的文化视角，可以归类于前述的社会文化生态学派的观察角度。第四编城市问题，是探讨城市中的各类问题，当然，又是综合的视角，既有典型的城市生态学视角，如《“符号化的权力”——城市十字路口的一项社会实验》，以及《我们为什么不按规矩过马路》，也有典型的城市政治经济学派视角，如《城市底层阶级再生产》《城市农民工子弟的成长困境》等。其实，笔者所谈的七种理论视角，就好比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七种工具，我们采用哪一种工具要看我们遇到的和需要解决的是哪一种问题。而且，解决一个问题，也可能需要多种工具，所以，我们在分析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时也可以把几种工具都使用起来。

总之，本书是笔者讲授城市社会学课程时，以北京市为调查对象，组织学生完成的关于北京城市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案例。学生们调研还是非常认真的，在此对所有参加笔者城市社会学课程的同学表示感谢。

李 强
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2013年6月

目 录

序 言 李 强 / 1

城市化

另一种“农民工”

——农民个体户的城市生活 曹 原 / 3
两代农民工的城市性代际差异

——一种历史与互动的视角 李 戈 / 14
北京外来务工农村女性调查 彭汐婷 / 28
是什么在“推拉”我们身边的临时工

——推拉理论在××社区非正规就业中的应用 于真泉 / 38
城市发展与“新莞人”面临的社会整合困境

——以东莞市某工业园区S厂调查为例 喻月慧 / 46
当高考遇上户籍

——记北京市“取消高考户籍制度公民联合组织” 段宗宝 / 61
被遗忘的角落

——城市拆迁中的“真空”地带：北京市崇文区A小区未拆迁区调查
..... 谢浪静 李一尘 崔 灿 燕 妮 邱惠国 汪胡秋霞 / 70

城市社区

两小区的停车道路 初 蕾 / 91

大学校园认知地图初步研究

——以清华大学为例 洪 韵 赵梦瑶 / 99

清华园街道里的“类蚁族”调查

——从照澜院里最老的平房区说起 承 骁 程 震 / 118

对外来人口聚居区安全机制的探讨

——以北京水磨社区为例

..... 温 莎 张 宇 雷李洪 王丹薇 彭春丽 / 133

东花市南里社区服务调查

..... 刘子曦 张倚琳 王 莹 沈若萌 李露诗 / 142

退休生活与社区支持

——一个“老龄化社区”的视角 唐佳斌 方震平 周逸群 / 162

浅析社区自治中居民话语权的缺失

——以北京崇文区东花市北里东区为例 陆臻里 / 171

社区运动参与者的实践策略与认同构建

——一项都市社区运动的个案研究 邢婧越 褚 琥 石文博 / 183

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思考

——以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为例

..... 罗秋实 马蓉蕊 李凝紫 李建慧 / 197

都市文化

非正规文化创意产业：底层精英的向上流动途径

——北京 Z 地街头歌手调查研究 罗 婧 / 209

北京 798 艺术区的转型与空间建构 胡 江 / 223

798 商业化状况调查报告 周景萍 / 239

北京蟠桃宫庙会变迁初探 李 珊 李灵曦 宋卫云 陈佳玮 / 249

城市中的同性恋组织

——一个亚文化视角的研究 李燕康 / 261

城市边缘群体的空间生产

- 近 20 年北京男同性恋群体与城市空间的符号互动 王晨阳 / 274
都市集体相亲现象探究 秦 菁 / 286
中国世俗城市中的基督教亚文化 周 旭 / 297

城市问题

“符号化的权力”

- 城市十字路口的一项社会实验 李林倬 / 309
我们为什么不按规矩过马路 常逸群 / 318
“妈妈，除了自杀我别无选择”：警醒学生的“城市病” 陆美贺 / 334
城市底层阶级再生产

- 在同一片蓝天下，难以实现的教育公平 纪洪超 / 350
城市农民工子弟的成长困境

- 北京市城市边缘人群调查 张仕敏 / 365
西直门地铁站出口卖假发票人群调查报告

- 来自农村的城市边缘人 张霖芝 邱 显 迟 祥 曹晓宁 郭凯锋 / 378
浅析名人故居保护现状

- 以清华园内照澜院故居群为例 佟 璐 / 389